

# 中国历史大规律

丁晓山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武 帅  
版式设计 尉红民  
责任校对 王洪霞  
责任印制 宋二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历史大规律/丁晓山著.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7-5035-3951-0

I. 中… II. 丁… III. 中国-历史-研究 IV.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9270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8 (发行部)

邮编: 100091 网址: [www.dxcbs.net](http://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印装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5.25

字数: 220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9.00 元



# 写在前面

历史的发展有没有规律呢？有的。正如史学家孙达人先生所言：“历史是亿万群众自己创造的，它的进程无疑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逻辑。”<sup>①</sup>

中国历史的发展有无其自身所特有的规律呢？有的。正如史学家王家范先生所言：“现今中外史学界都有同感，中国社会有许多迥异于西方的历史殊相，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等的传统和历史走向都极具个性。”<sup>②</sup>“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向为世界学者所公认而无异议。”<sup>③</sup>史学家田昌五先生说的更明确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虽然逃不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但无论和西方历史抑或和我们以往设想的东方历史相较，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均有其独具特色的地方。”<sup>④</sup>换句话说，中国历史走的是一条与西方历史的发展很不相同的道路，对西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并不—定可以照搬到中国来，解释中国历史的进程。

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有意义吗？有意义。古人对此早已论及。如宋代学者朱熹就讲过，“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要失。”元代学者胡三省也说，“善觇国者，不观—时之强弱，而观其治乱之大致。”用今人的话讲，人世间的一切问题没有比未来更

① 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② 张荫麟：《中国史纲·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③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6页。

④ 田昌五：《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学术月刊》1997年第1期。



为重要的了，而认识未来，除了通过研究历史之外别无他途。

中国史学界不是不重视研究历史规律，但长期以来，中国史学一直被“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公式”束缚住了，似乎除此之外别无规律可循。故而何新先生讲，多少年来，中国史学界一直在做两件事：“第一是尽可能地削足适履，扭曲、删改、修正中国历史，以便把它塞进这个外来历史公式的框架内，第二就是在‘历史规律’的名义下，将这个公式神化成不允许怀疑和批评的神圣教条。”结果使得“正是决定中国历史发展与欧洲不同的那些社会文化历史特征，几乎完全被忽视了。”<sup>①</sup>更谈不上去探讨什么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了。或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学者指出，中国现代学者尽管为探讨规律问题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自己总结的历史规律当属空白。这是值得深思的。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思想日趋解放，人们不再谈以往被神化的“公式”，而且似乎连历史规律这一类的宏观问题也不愿去说了。诚如一位史学家所指出的：“宏观尝试的受挫，使史家产生了一种厌烦心理，随即向微观方向奔去。近20年来，除了最初一两年重复了一阵宏观旧话题，史学界总体上都趋向于微观课题的开发，视宏义为畏途。”<sup>②</sup>

史家“视宏义为畏途”，除了上述原因外，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宏观研究实在不简单。如果说研究历史不易，研究历史规律很难，那么，研究中国历史的规律就更难了。但唯其如此，也就显得格外重要。

经过这些年的苦苦摸索，我对探讨中国历史规律

① 何新：《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何新史学论著选集》，时子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

②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这一问题逐渐形成以下两点看法：

其一，从理论上讲，人文科学的规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相对真理，而不是如同自然科学那样。科学哲学家亨普耳在《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sup>①</sup>一文中曾提出历史学家应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工作，但他自己也承认那是十分困难的。我们不能指望所谈的每一条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以说，历史科学中几乎不存在这样的绝对真理。

其二，从史料上看，既然是探讨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就应多去研究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思考。古人通过阅读大量史籍，结合自身的感受，用中国式的语言归纳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比如什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动一静，一治一乱”；“大乱居乡，小乱居城”；“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这些质朴的结论，为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提供了最有益的养分。

理论明确了，史料也有了，就可以“史论结合”地工作了，而最初的成果，就是展现在您面前的这本小书。毫无疑问，这本小书还很稚嫩，还很粗糙，甚至还有不少错误，期待着您的批评和指正。

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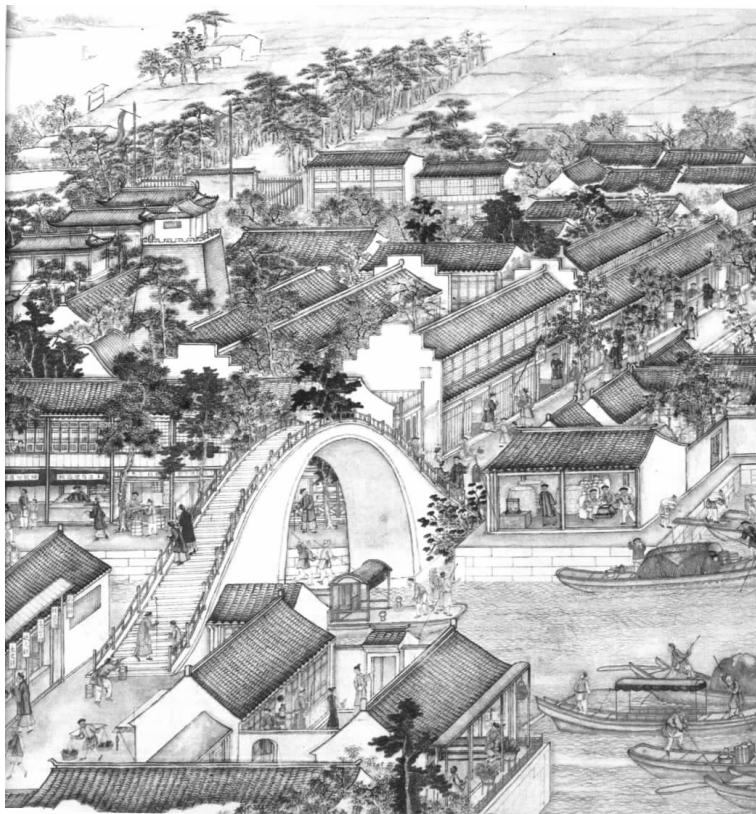
2008年7月于首都师范大学

<sup>①</sup> 中译文载《哲学译丛》  
1987年第4期。



## 盛世的首要表现就在政通人和

中国自古对盛世有许多好听的颂词，什么“莺歌燕舞”，“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什么“海宇宁谧，民乐雍熙”，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政通人和”。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首先就表现在政治是畅通的，社会是和谐的。



清·徐扬绘《姑苏繁华图卷》(局部)，辽宁省博物馆藏



## “政通”比“政清”重要

翻开中国的史书，会发现形容盛世时常用的一个词就是“政通人和”。“人和”好理解，“政通”呢？政，是指政治；通，是指通畅。为什么不说政清人和呢？难道说，政治通畅要比政治清明还重要吗？如果我们暂且抛开国家的阶级属性，先把国家看成一个组织，看成一个管理着亿万民众的机器，的确，政治通畅要比政治清明重要。这就好比一辆汽车，先得电路通，油路通，能开起来，有些小毛病也不打紧；而如果电路也不通，油路也不畅，开不了，那么这辆车才真是快没用了。

就拿秦朝来说，秦国是靠战争赢得天下的，秦国的军队可以说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队，秦国的上层也是很厉害的，什么远交近攻，什么商鞅变法，内政外交，都处理得不错。但打了天下后，怎么会二世而亡呢？以往老说这是因为秦政残暴，而秦国的统治，一向并不仁慈，怎么统一前没垮呢？看来还有其他原因。美籍华人，美国匹茨堡大学历史系教授许倬云先生指出，秦之速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政治不通，具体地说，就是中层与下层的疏离。

如果把国家比作一家公司，秦的上层也即董事这个层次，是很厉害的。那么，秦的中层也即部门经理这个层次，又是些什么人呢？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挖掘，我们今天已逐渐弄清，秦的中层，几乎全是军人。秦实现统一后，对六国旧地简直可以说是实行军事管制的。秦的军队，如同抗日战争时的日本人一样分驻各个据点，秦人死后，也是单独埋在一起，不与当地人混葬的。考古学家曾挖掘到一个大致相当于今天县长的秦墓，发现墓主就是当年秦军的一个普通士兵，随军出征，积战功奉派为县长职务。正如许倬云先生指出，“这样子就没有中层，中间全是他的军队，下层是隔离的。”秦国的上层很能干，但“下面是空的，整个没有社会基础支持，中间也没有管理层次的干部。”“上层对中层可以控得很好，中层联系下层的完全没有，可以说是一个半截的结构，下面与中间完全是散的，因此不能维持下去。”下层百姓的怨气、意见，很难通过这些秦国军人，反映到决策层去。政不通自然人也不和，不亡待何？

再看东汉，我们在学习历史时或许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



东汉比西汉弱。许倬云先生讲东汉整个治安的情形跟西汉比又差得很远，而防卫边疆的能力也跟西汉差得很远。东汉百姓的实际地位，也比西汉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许倬云先生认为，问题还是出在“政通”上，东汉时上层已僵化，不是上层的小圈子里的人，几乎爬不上去。而东汉时的“国立大学”太学，竟有三万多学生，用许倬云先生的话讲，“比今天的台湾大学大”，“台湾大学今天也不过一万多人而已”。教育机构不断地培养出中层的干部，却又不给他们往上爬的机会，结果日久生怨，这些人转而成为政府的对立面。大家知道，东汉的学生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的起源”，太学生里最优秀的一部分人成为政府的批评者和攻击者。如果说秦朝是中层与下层之间出了问题，那么东汉便是“上层和中间之间发生了问题”，但结果则是相同的：政不通，人不和。东汉国运不振，日趋衰弱。

上面举了两个反面的例子，下面再举两个正面的例子：

先看西汉。西汉的“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盛世。许倬云先生对汉代评价不低：“基本上，汉代的日子过得不算差，汉代老百姓过的日子跟与之同代的罗马帝国的老百姓一比，可算过得相当好。汉代有内乱，有外战，相对讲起来，次数不算多，和平的岁月相当长。”

但西汉一开始时是有很严重的问题的，至少有40年左右，从汉高祖刘邦打天下时起，他的军队里面，他的追随者、功臣，甚至跟他一起打天下的最小的小兵，慢慢都变成了干部。所有的功臣，有的封侯，有的封王，自己的子弟也封王，宰相都必须是有侯爵封号的人才能做，政府里部长阶层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是一起打天下起来的弟兄，这是一个很小的利益集团。有点像秦国的样子，中层与下层的沟通并不好。当时全国人口，汉高祖时大概是3000万左右，汉代100年以后人口达到4500万。打天下的功臣集团，从将军到小兵，不过15万人、20万人，但这20万的人要去统治一个三四千万人的国家，除了独裁、专制以外，是没有别的方法的。

缺乏一个畅道的中层，上层既无法将政令顺利地传达到下层，也不知道下面想些什么，老百姓需要什么。40年以后，这批人走了，接下去由他们的子弟接管了大概20年不到的样子，也不行了，政府显然许多事情办不通。因此汉朝不得不开



始寻找新的方向，逐渐发展出一个察举制度。

察举制度一步步发展，从开始发展到一个相当水平，大概花了两代人的时间，一步步改进，最后的模式是这样的：20万人里面，有一个人可以得到提名，要考核这个人的品行，要选最好的好人：孝子、廉吏、不贪污、不做坏事的人。但演变到后来，实际上是选拔当地大家认为最能干的人。请注意：是当地大家公认最能干的人，就是说，要过当地士人舆论这一关。汉代还有一个与察举相反的“征群”制度，即自上而下的选拔。天子选拔人才叫“征”，大官选拔人才叫“群”。但征群上来的人才，往往也要过察举这一关。用今天的话说，如果过不了“群众舆论”这一关，是走不到高位的，与后世的“一言堂”不同。所以有学者指出：“如果单从效果上看，汉代的选举制度可以说是历朝历代最好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既保证了人才的能力，也兼顾了人才的品质。”<sup>①</sup>可谓德才兼备。这样一位通过“群众”舆论的候选人先在地方政府工作，做地方的文官、秘书、科员，做得好了，县长推荐到内政部去，或推荐到省里去。省级政府试用了一阵后，觉得不错，就将他推荐到中央去，推荐到中央去的叫做“郎”。凡是各地推举进来的，到了中央都叫“郎”，最多的时候，一年有2000个郎。郎担任在王宫里里外外的事情，年轻人做守卫，做跑差事的侍郎，做秘书，做一些杂的事。除了太监要做的事情以外，皇帝四周的大小事情几乎都是郎来做，在这里，高级官员慢慢找出郎里面哪些人特别能干、特别好，而皇帝也看得出哪个郎好，哪个郎不好。

郎须通过考试，考的时候是设定现在有某个重大的问题，你说怎么办？譬如说，海峡两岸“三通”了，你的意见该怎么办？你写个政论文章给我看看，或者某地地震了，如何救济？写篇文章出来，看你的政治意见，看你的方案，然后从中选出一些人。这种考核显然更易看出一个人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若这个人说的不错，记在人事档案上，等到有更重要的事情，就派他去做。这是一个从选拔到训练的完整的程序。汉朝靠这个办法把全国的精英收罗在一起，一级级的训练，训练到最后还叫他参加政府的实际事务，然后考验他们，再派他们出去。派他们出去时，第一年是试用，试用得好，再给你两年，或三年的任命，三年的任命做好了，才决定加你的薪水，或升你的

<sup>①</sup> 张鸣：《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官，或贬掉你的职务。如此使汉代不仅有个相当健全的文官体系，而且更要紧的是，这些官员来自全国各处，20万人才选一个，这些人跟家乡总有来来去去的关系，总有消息，使得下层的事情都可以经过这些“郎”而传达到中央去。汉朝经常有朝廷上开会的事情，一开会，殿上面坐的是几百个大官小官，大殿底下，庭院里面一站，也可以站上两三千人，每个人都可以发言的。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讨论盐和铁该不该公卖的会议记录在，这就是《盐铁论》，从中可以看出有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官与郎的发言。从汉朝其他零零碎碎的记录里也可见常常有站在庭院里面的郎发言，皇帝照样听他的，发言完了大家讨论，如此全国各个层面各种意见都可以传到中央。

这样一个中层阶层，长久累积起来，退休的就回家，变成地方的领袖；年轻的进入政府，就变成官员。当然，最后汉代在“政通”方面仍发生了毛病，若干地方性的家族，垄断了地方上的权力，这是到了东汉，大毛病才出来。换言之，在没有毛病时，这个中层结构还不错，执行政令是畅通的，反映民情也是畅通的。这个中层是汉代最大的稳定力量。中层的人的升迁，速度最快的，是从提名为郎到征辟举孝起身，算21岁吧，10年后，到31岁做到二千石——从一个起码候选人做到郡守要十年、十五年并不稀奇，但是他也不会长久在高位子上，过一阵他就退下来了。汉代有一个对于老臣特别尊重的制度，当执政顾问是真要替国家办事情的。一般大概干到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六十岁以后回家。五十到六十岁这一段是资深政治家，好的、有用的摆在那里，帮中层做事。许倬云先生评价说，“这一个结构，我认为很好。假如我开一个公司的话，我要用一个很健全的中层干部组织，同时，有些能干的高级干部我一定留在旁边做我的高级顾问。我不要他管实务，要叫他替我想问题，替我排忧解难；当某个执行干部发生问题时，叫他们去调查毛病在哪里，叫他们去找出解决的方



世界上第一张纸币：北宋交子



案，叫他们去调解纠纷。”

再说宋代。许倬云先生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相当不错的一个朝代，读中学教科书时，总说宋代文弱、国势不振……这都是教科书写得不好。”大家知道，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对宋代评价是很高的。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宋代没有盛世之名，却有盛世之实。

宋代的一个特点，就是商品经济较前代繁荣。民间的力量成长起来了。据许倬云先生研究，宋代镇以上的居民点，比唐代增加了两倍半。整个社会迅速城镇化了，一批农民变成了市民。经济成长起来后，教育随之发展起来，民间的书院、学校很多，读书人也多了起来。用今天的话讲，宋代已有了一大批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的成员，包括读书人、商人、中下级官员等。许倬云先生说，宋代“是建立在真正的中产阶级的基础之上”的。或许正是看到了宋代的这一点，许倬云先生才讲：“宋代最了不起的就是，它的中层扩到几乎把下层全包进去了。而宋代中层，不一定是政治的中层，而是社会的、经济的中层。”有了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中层，宋代社会运转自如，民间的义庄（相当今天的基金会）、义学、商业行会、民兵……“使原本纯粹政治结构的中层，扩展成为非常复杂、多功能的中层，而这么多功能互相挟制、互相平衡、互相重叠，使得宋代的中层结构，即使上层垮光了，还是可以起作用”，说起来很有点“现代社会”的味道了。只是可惜，元代的入侵，打断了这一很有希望的发展势头。明清两代虽说也有盛世，但已是颇带汉唐两代意义上的那种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盛世，而非宋代那种民间经济、民间组织、民间教育、民间福利全面繁荣的盛世了。高王凌先生在研究清代农业时曾注意到，“至少从明代以来的600年来，中层组织的建设正是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sup>①</sup>什么事都由政府包办代替了。“政府在经济事务方面插手之深，可以说是空前的。”

① 《活着的组织》，第90页。

② 司马云杰：《盛衰论：关于中国历史哲学及其盛衰之理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大家知道，中国古代是很早就用阴阳学说来解释历史的。用一位当代学者的话说：“中国历史上，大凡昌盛之世，都是历史上阴阳两种根本关系、根本力量处理得比较好的时期，君臣、父子、夫妇、及上下各种关系与力量，都处于中正和谐状态。”<sup>②</sup>换句话说讲，就是要通，要和。

毛泽东也讲过这个道理，当然他用的是阶级斗争的语言。



史家评论说，“他特别看重干部要和群众一道参加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不能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sup>①</sup>如果干部脱离了群众，就意味着“中层”与“下层”脱节，政不通，人不和了。

综上所述，需要指出，所谓“脱节”，并非下层疾苦上层一无所知。这是不太可能的，在今天这个所谓“信息社会”，尤为不可能。不知百姓疾苦自古以来就是执政者的一大罪名。不是不知道，而是“不作为”。民国时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领军人物陈光甫在谈及国民党丢掉大陆的原因时讲：“反观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没有替农民做一点事，也无裨于工商业。”<sup>②</sup>执政的国民党不是不知道农民及工商业者的疾苦，而是不做，不为他所做一点事。

凡是盛世，一定是政通人和的，而要做到政通，中间这个层次十分重要。中层与下层相脱节，如秦朝，必然会出问题；中层与上层相隔离，如东汉，或如明清封建末世时中层的权与下层的钱相结合，也必然会出问题。只有中层相对比较健康（如西汉），比较发达（如宋代），社会才会比较正常地向前发展，如果这时自然灾害较少，上层决策也基本正确，国家自自然然步入盛世。

## 社会中层是关键

许倬云先生在比较了中国历史上周、汉、唐、宋等几个朝代后，把国家机器比作公司，他说：

有一个真正的企业机构在手上，我想最健全的企业机构，不是有个很能干的董事会而已，也不是有一个经营之神而已，一个好的公司必定是有一个很健全、很周密的干部体系，而这个干部体系，必定是不僵化的，必定是灵活运用的，必定是能够从下层往上提升，而随时将不好的人排除掉的，良好的新陈代谢，公司也必定是不只有一条管道传达消息的，必定是部门与部门之间联系很灵活的。这个中层的重要性，远比单单有个上层要紧。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1页。

<sup>②</sup> 杨天石：《抗战与战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75页。



强调社会结构中中层这一观点，在西方早就有人谈起过，古希腊时的学者亚里士多德（大约与我国的孟子同时），在所著《政治学》一书中就说：“凡是平民政体中没有中产阶级，穷人为数特多，占了绝对的优势，内乱很快会发生，邦国也就不久归于毁灭。”有过中、美两国生活经历的黄仁宇先生则认为中国尤其要加强中产阶层。

至此，我们所叙述的这条历史规律似可换一个说法：

盛世的表现之一，便是政通人和，政通是人和的前提条件。而要实现政通，就要特别重视承上启下的社会中层的发展。

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无不是都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社会结构是所谓橄榄形的，两头小，中间大。而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成果之一，便是初步形成了一个社会中产阶级。尽管目前这个“中产阶级”还远不能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相提并论，但这个还有待发展的中产阶级，正是我们今天这一盛世的社会基石之一。故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已破天荒地写入了十六大报告。经济学家董辅祗先生则指出，全面小康能否实现，关键就在“中产阶级”人数是否占多数。<sup>①</sup>而前苏联改革这么多年，“整个社会两极分化，没有中间阶级：一头是新俄罗斯人和政府官员，收入极高，但只占社会的少数，均15%~20%。另一头是社会的绝大多数，约占社会的60%~80%，这其中有一半是生活极其困难的，可说是艰难度日，有一半是勉强度日。”<sup>②</sup>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也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在《拆穿楼板运动》一文中说：

社会大波浪从哪一层掀起来的呢？是中层。中层的人，有的为了自身欲望，而对上层不平（第一种），有的为了对下层的同情心，同时对上层不平（第二种），还有表面同情于下层，骨子还是为了自身争权夺利（第三种）。他们动机不一定相同，结果激成社会骚动是一样的。

如果说，西方学者认为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力量，那么黄炎培先生似乎认定中间阶层也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力量。在同一文中，黄炎培先生又写道：

① 连玉明主编：《2004 中国决策报告》，中国时代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45 页。

② 项国兰：《亲历俄罗斯：一个访问学者的观察与思考》，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 页。



骚动的结果怎样的呢？如果属于第三种，在向上层进攻时，上层还能分一些富力和权力来一面诱惑，一面制止。如果属于第二种，等到下层都站起来和中层结合时，便将构成不可抗力量，不但上层无法和他们抗，连那才从中层爬到上层的第三种人，到中、下层一齐起来时，他也就和上层一齐倒下……

我们强调中层，并非表示上层就不重要。事实上，不要说远的，就说建国以后的历史，政不“通”之日往往也就是上层的人不“和”之时。比如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毛泽东说“华北会议骂了我40天娘，难道庐山会议骂你20天娘还不行？”<sup>①</sup>这么说显然是很不应该的。果然，毛泽东对这个话耿耿于怀，一再提及：“‘我们欠了20天的账，我看要补足20天，还是要40天’，还说‘再加5天’，‘满足骂娘的欲望’，等等。”<sup>②</sup>在气头上甚至还说出“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的话来。<sup>③</sup>闻者看到党内高层出现“不和”，无不摇头叹气。“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主人士章士钊看到中共上层矛盾尖锐，也深表忧虑，为此写信给毛泽东，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兴旺发达，全部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sup>④</sup>希望不要打倒刘，当然事情已无法挽回。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80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80页。

③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44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5页。

⑤ 张耐冬：《宏观中国史·盛世卷》，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绪论。

## “通”与“和”植根于人心的“顺”

或许有人会说：把政通人和作为盛世的表现之一，是可以理解的，可为什么要把政通人和，列为盛世的首要的、第一位的表现呢？曾有学者指出，何谓盛世特征？“简单来说，即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政治清明，边疆稳定。”<sup>⑤</sup>其实，没有国家机器的“通”和全体国民的“和”，上述种种“特征”就是有了，也长久不了。它们是“政通人和”的结果而非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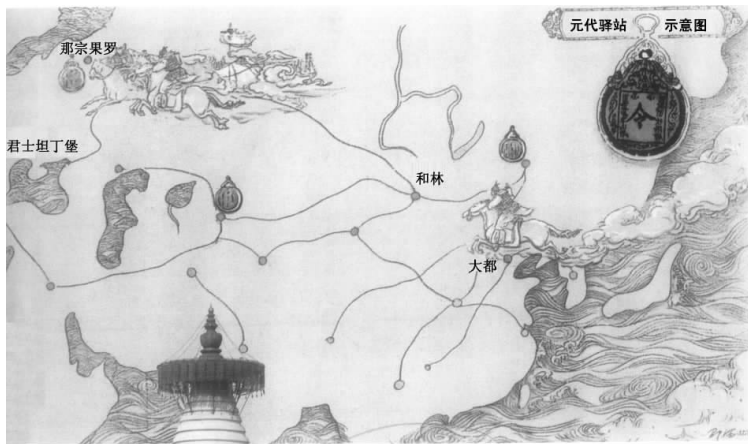
经济发展，不一定是盛世。如明代嘉靖、万历以后，经济一直是发展的，人民的生活也是有所提高的。但政治上腐败日深一日，难称盛世。

文化繁荣，也不一定是盛世。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



文化繁荣，大家辈出的时代，往往是乱世，如战国时的百家争鸣，魏晋时的玄学，明末清初的三大家，等等。

军事强盛，更不一定是盛世，相反倒有军国主义之嫌，如秦国，军力天下无敌，但如同二战时的德、日等军国主义国家一样，长久不了。许倬云先生讲：“我们一般所谓‘盛世’，通常指的是武功，这也是个错误的观念。在开疆辟土时，老百姓往往最苦，而大军凯旋归来时，背后又是靠着多少白骨撑在那里！所以我并不认为这能算是盛世。”<sup>①</sup>



元代驿站示意图

近来又有人提出盛世的表现首先在于人民有民族自信心。实际上，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以来是高于周边民族的文化的，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是牢不可破的，只是到了近代西方发达国家侵入中国，某些中国人才开始失掉民族自信心。而在此以前的几千年间，不论是盛世，还是乱世，中国人从未失去民族自信心。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中国自古观察历史的盛衰，皆不像现在看其盖了多少栋大楼，或经济增长速度如何，而是看天下和顺不和顺，人民安乐不安乐，社会教化及风气如何，整个国家民族的精神面貌与气质如何？”“观察社会历史盛衰，决不能只停留于物质的建设上，决不能只是以单纯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标准，更不能被泡沫经济一类现象所迷惑。”<sup>②</sup>

<sup>①</sup> 许倬云：《从历史看时代转移》，台湾洪建全基金会 2000 年版，第 66 页。

<sup>②</sup> 司马云杰：《盛衰论：关于中国历史哲学及其盛衰之理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6 页。



## 今天是“盛世”吗

“通”和“和”，是植根于人心的“顺”。这似乎有点只重道德不重经济的意味，但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因为人心是历史发展最深层次的一个因素，或许正因如此，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才会用人性来解释历史，认为“古往今来，人就是人，有不变的人性，因此，过去发生的事情在未来会以十分相似的方式重复出现。”<sup>①</sup>

据张琢先生在其《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一书中引用的台湾经济学家翁之镛的研究，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全国，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整个中国大陆实现统一，一共经过了2171年时间。将2171年分成盛世、治世、小休、衰微、乱世五个类别作分类统计，盛世有2次，其历时150年，占总年数的6.9%；治世有5次，其历时286年，占总年数的13.2%；小休有4次，共历时234年，占总年数的10.8%；衰微有6次，共历时466年，占总年数的21.5%；乱世有10次，共历时1035年，占总年数的47.7%。其中盛世最短，与治世加在一起，也只有总年数的1/5强，乱世的时间却长得怕人，将近占了总数的一半，这就是说，平均起来，每10年时间，几乎有5年是乱世，而盛世却不到两年。盛世，也真是谈何容易。

近日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是某位高官否认当今是盛世，也未辨真假。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嫦娥一号”成功飞入浩瀚太空，粮食总产量超过1万亿斤，对外贸易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也大为提高，不是盛世，又是什么呢？不过这也说明，人们心目中盛世的标准是很高的。

话说回来，如果把政通人和作为盛世的一个主要标准的话，我们今天是还有些差距。这主要反映在收入差距拉大可能导致社会断裂。不久前王绍光、胡鞍钢、周建明等专家撰文指出，城乡之间的失衡与断裂，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的城乡差别比中国更大。”<sup>②</sup>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存在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很正常。“但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差距之大，远远超过其他国家。”<sup>③</sup>

<sup>①</sup>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5页。

<sup>②</sup> 《2004中国决策报告》，中国时代出版社2004年版，第402页。

<sup>③</sup> 《2004中国决策报告》，第402页。